

从“原子化生存”到“共同体建构”:大学生网络 社交圈层化的思政审视

刘伟, 苏涵

(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搭子文化”作为当代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典型表征,折射出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原子化生存”的深层困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视角,对大学生“搭子社交”进行批判性审视。研究发现,搭子社交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目标导向、边界清晰、圈层固化的特征,进而从技术赋能、个体化进程与社会结构转型三个维度剖析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潜藏的个体化加剧、公共性萎缩与共同体意识弱化等价值隐忧,最后从价值引领、关系重建与实践赋能三个维度提出引导策略,以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搭子文化;原子化生存;共同体建构;网络思政教育

[作者简介]刘伟(1995—),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苏涵(2006—),女,浙江衢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搭子文化’视角下的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研究”(项目编号:2024WLSZ04)。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308010>

[中图分类号]G641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搭子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蔓延。饭搭子、学习搭子、健身搭子、旅游搭子等称谓,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交范式的兴起。这种社交模式具有明确的目标、亲密但有边界、用完即走的轻量关系等特征,深刻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交往生态。研究表明,超过七成的大学生拥有不同类型的搭子,即基于共同兴趣的趣缘性搭子和基于共同事务的事缘性搭子。

从表面看,搭子文化似乎是技术进步与个体选择的双重产物。社交媒体提供了精准匹配的便利,大学生获得了高效陪伴的满足。然而,若将这一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审视,便会发现其背后潜藏着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当代青年正在经历一场从共同体成员向原子化个体的身份蜕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搭子社交将社会关系切割为碎片化的功能模块,使总和沦为拼盘,这正是“原子化生存”在数字时代的微观投射。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审视搭子文化提供了分析框架。马克思将交往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认为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并随着生

产力的变革而变革。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交往应当是全面的、普遍的,使人得以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交往日益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情感联结被工具理性所侵蚀。当代大学生的搭子社交,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一异化逻辑。搭子关系以目标一致性为首要前提,以功能互补性为基本特征,交往双方成为彼此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康德伦理学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而搭子社交中的“人—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置换为“人—工具”关系。这种工具化取向,与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物的依赖性具有同构性——只不过在数字时代,“物”的形态从商品转变为数据、算法与流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青年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些品质的养成,离不开丰富的社会交往实践和深厚的共同体情感。搭子社交所营造的轻量连接、边界清晰、成本可控的交往模式,虽能缓解即时性的孤独焦虑,却难以孕育持久性的价值认同与深沉性的情感归属。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直面和回应的时代课题。因此,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

交往理论为视角,对大学生搭子社交进行批判性审视,探究大学生搭子社交的表征、成因、价值隐忧及其引导策略,试图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提供理论参照。

二、搭子社交的现象表征

(一)目标导向:以共同事务为纽带的精准匹配

搭子社交的首要特征在于其鲜明的目标导向性。无论是背单词过六级、相约阳光长跑,还是组队完成课程汇报、策划假期旅游,搭子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均以明确的目标为前提。受访者A坦言“得看目标吧”,其背单词搭子因“都想要过六级”而结成;受访者B强调“目标一致,追求相同,步伐坚定”;受访者C的学习搭子因“下节课要进行小组汇报”而分工协作。

这一目标导向性使搭子社交呈现出“精准匹配”的特征。大学生不再像传统社交那样从情感共鸣出发寻找朋友,而是从功能需求出发寻找合作伙伴。受访者D与旅游搭子形成“我做攻略、他负责A钱”的功能互补;受访者C的学习小组呈现“有人做PPT、有人演讲、有人统筹”的分工协作。这种“目标—功能”导向的交往模式,使搭子关系具有高度的场景依附性——一旦脱离特定场景或目标完成,关系便可能自然消解。

(二)边界清晰:亲密但有距离的维系机制

搭子社交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其精细化的边界管理。大学生通过话题边界、情感边界、时空边界和关系边界的多重机制,构建起“亲密但有边界”的交往形态。

在话题边界上,搭子间沟通被严格限定于共同目标领域。受访者B描述“每天第一个话题就是早饭照片”,始于减脂目标;面对隐私话题,他们常常采用“止住吧,转移话题”“打哈哈就过去了”“含蓄暗示再明确拒绝”等策略。在情感边界上,受访者B明确表示“不会被捆绑,不需要无时无刻去回应他的情绪,也不会渗透到我的私生活”,体现了情感投入的精准控制。在时空边界上,搭子关系限定于特定场景,受访者A的旅游搭子“仅限于旅游”,“放假了就消失不见”。在关系边界上,他们普遍对“搭子”与“朋友”进行了区分:朋友“可以全天陪伴,聊什么话题都可以”,而搭子“最初的话题始于共同目的”。

(三)圈层固化:同频偏好下的社交闭环

搭子社交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其圈层化结构。大学生倾向于寻找兴趣、目标、节奏相似的“同频”对象,形成相对封闭的交往圈层。在访谈材料中,这种社交圈层还呈现出一定的固化倾向,“社交面

仅限于舍友或同班同学”“圈子小,好像也就仅限于寝室”“信息茧房一定程度上存在”。

这种圈层固化源于搭子社交的筛选机制。受访者A描述其室友关系从“四个人一起出行”逐步筛选为“两个人一起上下学”的过程,体现了从泛泛之交中沉淀出同频搭子的筛选逻辑。受访者B在周围筛选过一遍之后,发现没有符合预期的人,才会去扩大范围,折射出同频偏好对社交范围的压缩。长期只与“同频”搭子交往,使大学生的认知视野被限定于圈层内部共享的惯习之中,难以接触异质性的思想与差异化的经验。

三、搭子社交的成因透视

(一)技术赋能:数字平台的精准匹配机制

搭子社交的兴起首先得益于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兴趣标签、地理位置等功能,为大学生提供了精准匹配交往对象的便利渠道。校园墙、微信群、社交App等数字媒介,使“寻找背单词搭子”“征集旅游伙伴”等需求得以快速响应与高效对接。

从技术哲学视角审视,数字平台重塑了交往的形态。海德格尔警示技术不仅是手段,更是一种座架,它框定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数字平台的精准匹配逻辑,将人按照功能属性、兴趣标签进行分类与筛选,使“找搭子”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类似消费选择的特征。个体是需求主体,他者是服务供给者,交往是目标达成的手段。这种技术座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大学生的交往观念,使其习惯于以“目标—效率”的逻辑对待人际关系。

(二)个体化进程:原子化生存的风险规避

搭子社交的第二个成因在于当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中个体从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脱嵌出来,成为“为自己而活”的独立决策主体。这种个体化进程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为:远离家乡求学、脱离原生家庭庇护、面临学业与就业的多重压力,传统深度关系的经营成本使其望而却步。

在此背景下,搭子社交成为大学生应对社交困境的权宜性选择。一方面,搭子社交以“低成本、高效率、轻负担”的特征,满足了大学生缓解孤独感的即时需求。受访者B认为搭子可以“降低孤独感”,受访者A强调搭子的“陪伴作用”。另一方面,搭子社交以“边界清晰、有限责任、随时退出”的机制,规避了深度关系可能带来的情感风险。受访者A“太冒昧会不舒服”的敏感,受访者B“成本低、不需要花太多情绪”的计算,均体现了对深度关系风险的防御。

(三) 社会结构转型: 竞争压力下的效率追求

搭子社交的第三个成因在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竞争压力。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学业竞争、就业焦虑、阶层流动等多重压力,效率成为衡量一切活动的核心指标。在这一背景下,搭子社交的精准陪伴恰好契合了效率至上的社会逻辑,即以最少的时间投入、最低的情感成本、最高的目标达成率,完成特定场景下的社交需求。

大学生将搭子社交界定为追求效率的过程,受访者B强调“立马开始”的即时性,受访者A与旅游搭子的互补分工体现了效率优化。这种效率追求并非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压力的内化。大学生将社交关系纳入效率计算的框架中,正如福柯指出的,现代社会通过自我技术实现个体的自我规训。搭子社交中的打卡监督、目标管理与进度追踪,正是大学生通过他者实现自我治理的技术实践。

四、搭子社交的价值隐忧

(一) 个体化加剧: 从“社会人”到“单子化存在”

搭子社交的深层危机在于其加剧了当代大学生的原子化趋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描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体看似获得了独立自由,实则被更深地嵌入物的体系之中。当代大学生的搭子社交,正是这一逻辑的数字变体:个体看似拥有了选择交往对象的充分自由,实则被算法推荐和兴趣标签所规训;个体看似在多个搭子关系中实现了社交丰富性,实则部分关系可能呈现浅层化、短期化倾向。

这种原子化存在对大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批判了市民社会中原子化个体的“特殊性”,即只关注自身利益而缺乏对普遍性的认同。当代大学生在搭子社交中所体验到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特殊性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搭子类型、自由设定交往边界、自由决定关系存续,却难以体验到普遍性的自由,即在共同事业中实现自我超越的自由。

(二) 公共性萎缩: 从“公民”到“消费者”

搭子社交的第二个价值隐忧在于公共性的萎缩。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将行动视为人最高级的活动,认为行动的本质在于开始,即在公共领域中开启新的事物、创造新的可能。而搭子社交中的交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还原为劳动或工作——前者服务于生物性生存,后者追求功能性目标,二者均缺乏行动所蕴含的公共性与开创性。

当大学生将社交关系按照功能模块进行拆解,

例如,一个搭子负责学习监督,另一个搭子陪同吃饭,他们实际上是在以消费者的逻辑对待人际关系。在消费社会中,个体是权利主体,关系是服务产品,交往是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者逻辑渗透到社交领域,导致大学生将他人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服务提供者,而非共同建构公共生活的合作伙伴。

(三) 共同体意识弱化: 从“我们”到“我”

搭子社交的第三个价值隐忧在于共同体意识的弱化。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区分了两种人类联结方式:共同体基于情感、传统和共享的价值认同,社会基于理性、契约和个体的利益计算。搭子社交在很大程度上趋近于社会而非共同体。它以理性契约为基础,以利益计算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纽带。

这种社会性对共同体性的替代,可能对大学生民族精神与时代责任的培育产生潜在影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价值传统,强调个体对家族、社群、国家的责任与归属。而搭子社交所培育的有限责任、随时退出、边界清晰的交往伦理,与这种传统形成了隐秘的冲突。还需警惕的是,圈层固化可能为错误思潮的传播提供条件。桑斯坦指出,信息茧房使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从而陷入认知闭环。当圈层内部缺乏异质性声音的制衡,极端化观点便容易在同频共振中被放大与强化。

五、引导策略

(一) 价值引领: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面对搭子社交的工具理性膨胀,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强化价值引领,引导大学生在交往中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类型:工具理性关注“如何做”(手段的有效性),价值理性关注“为何做”(目的正当性)。搭子社交过度膨胀了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的缺位使交往沦为无目的的手段堆砌。

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引导大学生反思:我们为何需要交往? 交往的终极目的何在?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给出的答案是:交往的根本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真正的交往应当使双方在相互承认中确证自身的价值,在共同行动中实现自我的超越。

具体而言,高校应当通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交往教育。在“友善”教育中,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真诚的情感交流比精准的功能匹配更具价值;在“和谐”教育中,引导大学生理解包容差异、化解矛盾比筛选同频、回

避冲突更需能力;在“敬业”教育中,引导大学生体认持久投入、责任担当比有限责任、随时退出更见品格。通过价值引领,使大学生在数字交往中保持对“人之为人的目的性”的自觉。

(二)关系重建:从轻量连接到深度联结

面对搭子社交的边界过度化,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推动关系重建,引导大学生在交往中实现从“轻量连接”向“深度联结”的转化。深度联结并非要求所有交往关系都发展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关系,而是强调在交往中保持对“他者”的开放性和对“关系”的投入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大官本身也是为了做大事。”“做大事”需要“大格局”,而“大格局”的培育离不开与“大他者”的深层对话。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为大学生创造与“大他者”相遇的机会:通过经典阅读与先贤对话,通过社会实践与楷模同行,通过自我反思与理想自我照面。

在实践层面,高校应当创新交往场景的设计,打破搭子社交的圈层壁垒。一是优化校园活动体系,减少强制性组队,增加开放性活动,为不同背景学生的自然接触创造条件;二是强化班级共同体建设,通过集体学习、集体劳动、集体文体活动,培育“同班共学”的归属感;三是拓展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大学生在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过程中,体验超越个体私利的价值实现。通过这些举措,使大学生在多元交往中拓展认知边界,在深度联结中培育共同体意识。

(三)实践赋能:从数字原住民到数字公民

面对搭子社交的圈层固化,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加强实践赋能,引导大学生在数字交往中实现从“数字原住民”向“数字公民”的升级。“数字原住民”是技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公民”则是技术伦理的主动建构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需要培育具有媒介素养和伦理自觉的数字公民。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将数字素养培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在认知层面,帮助大学生理解算法推荐的运作逻辑,认识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在情感层面,引导大学生体验跨圈层交往的丰富性,培育对多元差异的包容心态;在行动层面,鼓励大学生主动打破圈层壁垒,参与跨群体的网络公共讨论,在数字空间中践行“理性、平和、文明”的交往伦理。

尤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引导大学生认识到:数字技术的应用并非价值无涉,其使用方

式始终蕴含着价值选择。当算法推荐不断推送“同频”对象时,主动搜索“异质”信息就是价值选择;当圈层文化鼓励“圈地自萌”时,跨圈对话就是价值选择;当搭子社交倡导“有限责任”时,深度投入就是价值选择。通过这些日常性的价值选择,大学生可以逐步建构起“数字公民”的主体性,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守护交往的本真价值。

六、结语:在数字时代重建“在一起”的本真意义

“搭子文化”的兴起,是数字时代大学生应对社交困境的创造性回应,也是社会结构转型期青年群体“原子化生存”的微观表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审视,搭子社交在提供“精准陪伴”的同时,潜藏着工具理性膨胀、公共性萎缩和共同体意识弱化的价值隐忧。这些隐忧并非搭子社交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数字时代交往异化的深层症候。

面对这一时代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简单地“禁止”或“否定”搭子社交,而应当秉持“批判性审视”与“建设性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在理解青年、尊重青年的基础上,引导大学生在数字交往中实现主体性的升华。这种升华,是从“原子化个体”向“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跃迁,是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范式转换,是从“轻量连接”向“深度联结”的关系重建。

马克思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为当代大学生的交往实践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指向。在通往这一理想的道路上,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成为照亮方向的灯塔,引导青年在数字时代的交往实践中,既保持个体的独立与尊严,又融入共同体的温暖与力量——在“在一起”的本真意义中,实现从“我”到“我们”的升华,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

参考文献:

- [1]王昕迪,胡鹏辉.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23(8):90-95.
- [2]廉思.“搭子社交”:青年社交模式的新表征[J].人民论坛,2024(9):96-100.
- [3]吴钊,杨月.迈向“分子化”社会的可能:基于青年社交媒体趣缘搭子自主交往与关系重塑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1):83-101.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
-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
-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4:47-52.

[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杨云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2.

[8]孙凯奇,陆珈怡.当代青年“陌生化”轻社交的兴起及其生产逻辑——以“搭子社交”为例[J].青年探索,2025(1):101-112.

[9]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3(2).

[10]杨鑫.青年“搭子社交”现象:缘何流行、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4(2):106-111.

[11]伍玥,许亨洪.青年社交“搭子”的样态、成因及其引导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4(10):78-83.

[12]张萍,梁玉洁.青年网络社交“圈层化”场域关键要素与理论逻辑——基于圈际青年扎根理论研究[J].西部学刊,2025(10):65-68.

[13]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社会资本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4,36(7):6-15.

[14]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A].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25-926.

[15]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6-160.

[16]鲍曼.流动的现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45-50.

[17]李艳馨,冯沛雅.“搭子社交”视域下大学生交友观探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6):145-150.

[18]福柯.自我技术[A].汪民安,编.福柯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8-82.

[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2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7-200.

[21]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5-178.

[22]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7-70.

[23]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8.

[24]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6-160.

[25]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12.

[26]骆郁廷.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6-160.

[27]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8.

[2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29]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8-82.

[30]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23-28.

[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Z].2017.

[32]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4-26(2).

[33]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兼论“平台型媒体”是未来媒介发展的主流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5(2):41-44.

[34]冯刚.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5-50.

[35]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5-1(2).

From “Atomized Existence” to “Community Building”: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mination of Online Social Circle Form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LIU Wei, SU Ha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Quzhou University, Quzhou Zhejiang 324000, China)

Abstract: “Buddy culture”, a representative manifestation of online social circle formation among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s, reflects the deeper predicament of “atomized existence” among young people in the digital age. Drawing on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companion-based socializ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t identifies three salient features: goal orientation, clearly defined rel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social circles. It then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technological enablement, individual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nd discusses the associated concerns, including intensified individualization, declining publicness, and weakene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guidance strategies centered on value orientation,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mpowerment. The study seek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for cultivating a younger generation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buddy culture; atomized existence; community building;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